



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

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

卡尔·洛维特著

李秋零 田 薇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 / (德)
洛维特著；李秋零，田薇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2.5

(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

ISBN 7-108-01612-5

. 世... . 洛... 李... 田... . 历史哲
学 - 研究 - 西方国家 . 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9234号

CHINESE ACADEMIC LIBRARY OF
CHRISTIAN THOUGHT(ed. by ISCS)

Weltgeschichte und Heilsgeschehen

Die theologischen Voraussetzungen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by Karl L with
[c]1949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nese translation [c] 1997 by Institute of Sino - Christian Studies

责任编辑 舒 炜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2002年5月北京第1版
200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1/32 印张9.75
字 数 217千字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17.00元

总 序

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欧美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译述，汉语思想的现代学术品质和形态日显丰富，王国维尝言：“周、秦之语言，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时之语言至翻译西典时，而又苦其不足。”百年来的西典译述，为汉语学术拓展自身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译五洲之学术，以裨华夏学术，迄今仍为中国学者之一大务。近十余年来，译述之业日渐向纵深和广度扩展。

基督教学典是西方思想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然而，在百年来的西典汉译事业中，基督教学典的译述却至为单薄。20世纪40年代，美国汉学家章文新博士创设“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翻译计划，与我国学者谢扶雅教授等共同致力编译，至20世纪60年代已成三十二部。《集成》开创了基督教典籍的汉译事业，但也有历史的局限：选题系统性强而译述零碎（不少典籍为节译）；汉译表达不尽人意，可读性不臻理想，对19世纪以来的学典顾及较少，而且，《集成》未完成预定规划而告终。

本文库愿承继前辈学者汉译基督教学典未竟之业，以补百年来汉译西典文业之阙。

基督宗教的历史有社会和学术两个层面。社会层面是基督教会的形成和发展史；学术层面是基督信理在神学、哲学、伦理思

想、文学艺术中的表达。这两个层面尽管有关联，仍各具不同的形态和品质。本文库定名为“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表明文库仅涉及基督教的学术史文献，旨在丰富汉语学术典藏，加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与认识。

文库分为两个系列：1. 古代系列（希腊化时代至中古末期）；2. 现代系列（16世纪至20世纪）。选题不限于历代神学家的著述，也包括历代重要哲学家、文学家的学术著述。

文库的编译工作由中国人文学者从事，并邀请海内外资深学者为学术顾问。此类学典的汉译事业在整个西学汉译事业中仍显年轻，百年来积累的译述经验不多，有的甚至是初尝，如东正教学典的汉译，在术语酌定方面，尤为艰难。译述之辞不达意乃至错误，实际难免，文库编译者诚盼学术界同仁不吝指教。

文库编、译者愿承中古汉语学者为丰富中国文化传播佛典之心智和毅力，愿文库有益于中国学术的现代发展，“安知不如微虫之为珊瑚与赢蛤之积为巨石也”。（章太炎语）

刘小枫博士

1993年11月于北京

中译本导言

一、洛维特其人及其思想生涯

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1897年生于德国慕尼黑，1973年卒于海德堡，是汉语学界不太闻名，而在德国和欧美甚有影响的哲学家和基督教思想家。洛维特出生在信奉新教的家庭，其父是颇有名气的画家，洛维特在中产阶级的闲适生活中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其父在慕尼黑市区有豪华住宅，在Starnberger湖畔有消暑别墅。洛维特在少年时代就对哲学感兴趣，13岁开始读康德、施莱尔马赫、费希特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这部被洛维特后来视为充满激情的现代性经典，对少年洛维特的思想触动最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资产者生活的宁静和闲适。洛维特18岁时参加自愿兵，赴奥地利意大利前线作战，负过重伤。战后，洛维特进慕尼黑大学学习哲学和生物学，师从慕尼黑现象学小组的主要成员A. Pfänder和M. Geiger。其时，慕尼黑正闹共和革命，洛维特觉得这个城市变得“太嘈杂”，转学至弗莱堡大学，听胡塞尔(E. Husserl)的课，并与其时为胡塞尔助手的海德格尔(M. Heidegger)结为知交，在一段时间里，两人曾书信往来

频仍。哲学讲师海德格尔引导洛维特研读胡塞尔的《逻辑研究》^①，以及狄尔泰（W.Dilthey）、柏格森（H.Bergson）和西美尔（G.Simmel）的著作。洛维特觉得，在弗莱堡大学哲学系的三年学习（1919~1922），是其求学时代思想收获最丰的时期，在海德格尔思想影响下，洛维特逐渐感触到何为哲学思想的时代重负。

洛维特在M.Geiger教授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论尼采的自我解释和对尼采的解释》（1923）。毕业后，洛维特面临人生之路的选择：要么进入文化界，加入以诗人盖奥尔格（S.George）为首的文人和学人圈子的团伙性文化活动；要么跟海德格尔去马堡大学深造。1919年，洛维特在慕尼黑听过韦伯（M.Weber）的著名演讲“学术作为志业”，韦伯拒绝学者充当时代的精神先知和救星，主张持守精神守夜人职分，对洛维特的人生选择有相当影响。他对其时由知识人鼓动的群众政治运动持审慎的怀疑态度，视这些运动为知识人的非理性思想趋向的反映，实际的政治后果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运动的出现。洛维特选择了跟海德格尔去马堡大学撰写讲师资格论文。在马堡时期，洛维特与加达默（H-G.Gadamer）、克吕格（G.Krüger）和施特劳斯（L.Strauss）结为密友，时常聚会，一起朗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小说，尽管海德格尔认为这种集体阅读方式是浪

^① E.Husserl，《逻辑研究》，卷一，倪梁康译，上海译文版，1994。

关于这个圈子的活动，参上山安敏，《神话与理性：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欧洲的知识界》，孙传钊译，上海人民版，1992，页21以下。

参M.Weber，《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编译，台北远流版，1991，页131以下。

L. With推崇的德语思想家除韦伯外，是布克哈特，称他为成熟的自由精神的“教育家”，在时代精神的错乱中“不疯狂”，冷静地独立思考。关于布克哈特思想，参J.Burckhardt，《历史的反思》，施忠连译，台北桂冠版，1992，英译本编者序。

费时间。

海德格尔接任胡塞尔在弗莱堡大学的教授职后，洛维特跟海德格尔再到弗莱堡，在海德格尔指导下完成了对海德格尔的思想路向带有批判性的讲师资格论文：《人的共在中个体的角色》（1928）。随后，洛维特转向社会思想研究，尤其是马克思和韦伯的社会理论。洛维特是新教徒，对基督教神学的现代论述相当关注，尤其是欧韦贝克（F.Overbeck）、巴特（K.Barth）、施韦策尔（A.Schweitzer）和布尔特曼（R.Bultmann）。此外，洛维特对历史思想亦有兴趣，被布克哈特（J.Burckhardt）、特洛尔奇（E.Treoltzsch）的问题吸引。

洛维特思想的构成要素是生存哲学（尼采、海德格尔）、历史哲学（布克哈特、特洛尔奇）、社会哲学（韦伯、马克思）和新教神学（基尔克果、布尔特曼）。在获得讲师资格后至1933年的几年内，洛维特出版了下列著作：《黑格尔与黑格尔主义》（1931），《理论与实践作为哲学问题》（1931），《韦伯与马克思》（1932；英译本，1982），《19世纪对基督教的哲学批判》（1933），《基尔克果与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哲学和神学的克服》（1933）。这些著作的篇幅都不大，却未必逊于诸多虚实不侔的洋洋大著，显示出独特的思想洞察力。

纳粹执政后，身为犹太人，洛维特流亡意大利罗马，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员从事哲学研究，一住五年，其间撰有《尼采的永恒复归哲学》（1935），《布克哈特：这个历史之中的人》（1936）；1938年排犹扩大，洛维特流亡日本，在仙台大学任欧洲

参K.L with，《纳粹上台前后我在德国的生活》，Frankfurt/Mainz，1989，页64。洛维特在二十至三十年代与德国知识界名流有许多交往，他的这部回忆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思想史教授，其间的主要著作有：《欧洲虚无主义：对欧洲战争的前历史的考察》（1940），《从黑格尔到尼采：19世纪思想中的革命性断裂》（1941，随后有英、意、日、法译本；中译本已列入三联书店版“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即出）；此书使洛氏获得思想界的国际声誉。在德国驻日使馆的压力下，洛维特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被迫离日，取道北平赴美，在神学家蒂利希（P.Tillich）和尼布尔（R.Niebuhr）的帮助下，到美国Hartford神学院教授基督教早期教父思想，著有《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1949/1953），《自然与历史》（1951）；1949年受聘为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思想史教授；1952年，经加达默努力，洛维特返回德国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至1973年去世，其间的主要著作有：《海德格尔：贫乏时代的思想家》（1953），《知识、信仰、怀疑》（1956），《对东西方差异的观察》（1960），《从笛卡儿到尼采的形而上学中的上帝、人和世界》（1967），《瓦雷里（P.Valery）思想的基本特征》（1970），对德语思想界产生了数代的影响。

虽然个人生活颠沛，洛维特从未中辍思想研究。表面看来，

例如哈贝马斯；参哈贝马斯，《访谈录：现代性的地平线》，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人民版，1997，页43。洛维特的思想生平资料，参K.L. With的自述，“个人简历”，见氏著《纳粹上台前后我在德国的生活》，同前，页146—157；W.Ries，《洛维特思想评传》，Stuttgart，1992，页1-24；B.Lutz，《洛维特》，见Metzler Philosophen Lexikon，Stuttgart，1989。《洛维特全集》至1988年出齐（Stuttgart/J.B.Metzler版），共九卷：1.《人与人的世界：人类学文集》，1981，500页；2.《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批判》，1983，617页；3.《知识、信仰与怀疑：出自宗教和神学的批判》，1985，469页；4.《从黑格尔到尼采》，1988，561页；5.《黑格尔与19世纪中哲学的扬弃/论韦伯》，1988，454页；6.《论尼采》，1987，555页；7.《论布克哈特》，1984，393页；8.《海德格尔：贫乏时代的思想家》，1984，298页；9.《上帝与世界》，1986，421页。其著作的英译选本有：A.Levison编，Nature, History, and Existentialism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Evanston, 1966。

洛氏著述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的时代惶惑无甚关系，实则不然。除了生存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外，洛维特的著作基本上是近代思想史论述，但却是思想家的思想史论法。无论人物专论还是历史论述，都不是清单式的思想史（某年代某时有某人写了什么，主张什么，像汉语学界一大堆如此通史或人物论），而是带着时代问题的现象学询问，辨析西方近现代思想中上帝观、人观、历史观的嬗变，极于毫芒，以此探究西方现代社会的惶惑旅程的精神根源。

欧洲近几百年的思想嬗变扑朔迷离，究竟问题在哪里？欧洲社会的现代命运与现代思想究竟有什么关系？时代的思想家躲不开这一问题。思想家式的现代思想史反思有不同的方向，如新马克思主义自由派霍克海默（M.Horkheimer）和阿多诺（T.W.Adorno）的《启蒙辩证法》（中译本，重庆版，1990）；新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中译本，山东人民版，1988）；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K.Popper）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译本，台北联经版，1985；河北山西高校联合版，1995）、柏林（I.Berlin）的《反潮流》（Oxford，1992）、《俄国思想家》（台北联经版，1987）。洛维特与海德格尔则是现象学的思想史反思方向的代表，就涵涉面而言，海德格尔遽逊于洛维特。尽管洛维特的两部重要著作（《从黑格尔到尼采》和《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在英语学界声誉卓著，流传很广，但英美学界一直对他重视不够。八

两部权威性的思想家辞书均未收入洛维特，反映了英美学界对洛维特的忽视，J.Wintke编，《现代世界文化词典》，祁阿红等译，江苏人民版，1988；迪瓦恩主编，《二十世纪思想家辞典：生平、著作、评论》，贺仁麟总校译，上海人民版，1996。由众多当代汉语学界大师“具体指导”并帮助选材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等编译，上海译文版，1984）和《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田汝康、金重远选编，上海人民版，1982），均未收洛文。

十年代以来，洛维特的思想随全集出版，逐渐广为论者称道。

二、现代性与虚无主义

为什么洛维特的思想史辩证主要集中在18至19世纪？洛维特生活的时代，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想冲突已演化为实际的社会政治冲突。这些主义论述兴于18世纪，盛于19世纪，引导出20世纪一连串政治事件，连洛维特崇敬的哲学导师海德格尔亦失足其间。洛维特对各种主义论述都持怀疑的观审立场，这种态度促使他审理时代思想中漫为浮论的主义论述的哲学根源。哈贝马斯（J.Habermas）看出，洛维特想要把握现代性与古代性的关联。问题是，致力理解现代性与古代性的关联，洛维特并非第一人，亦非最后一人。在他之前的大思想家有布克哈特、狄尔泰、特洛尔奇、韦伯，在他之后有布鲁门伯格（H.Blumenberg）和柏林。洛维特的思想特色何是？

洛维特对主义论述的审视态度，尽管受到韦伯激发，主要还是基于其个体心性，韦伯的学问论只是激励其个体心性的外在契机。洛维特的个体心性崇尚精神自由、冷静明辨，不为时代浮论所惑。在他看来，哲学的职分是带着怀疑探询真实，明澈思想的虚实。作为哲学家，洛维特自有其关心的基本问题：历史的意义和个体生活的意义。这种询问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历史具体的，即从现代性处境来询问历史的意义和个体生活的意义。

参J.Habermas，“洛维特：历史意识的斯多亚退却”，见氏著，《哲学、政治的面相》，Frankfurt/Mainz，1987，页195。

就后一问题而言，代表著作应是《基尔克果与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哲学和神学的克服》，围绕这一论题的论著有《从黑格尔到尼采》、《人的共在中个体的角色》、《知识、信仰、怀疑》、《从笛卡儿到尼采的形而上学中的上帝、人和世界》、《韦伯与马克思》等。这些著作构成了洛维特对现代哲学思想在个体人的生存定位上的困惑的探索。洛维特虽然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但他的思考是哲学的，而不是神学的。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他充分懂得神学与哲学的思想语法差异：神学和哲学的差别，根本上基于理解生活的方式不同，它们的相遇和分离的土壤不稳定，哲学本质上是怀疑的思辨，与信仰的回答（神学是这种回答）不相干。对基督身上的上帝启示的信仰，是个体性的生存事件，它可能把怀疑领向信仰，却不能以信仰拆除怀疑。哲学的怀疑只能由哲学的明辨之思去解除。反之，以哲学代替信仰，是哲学的僭越。洛维特尖锐批评后期海德格尔哲学，认为这种哲学遁入一种漂浮的宗教语态和情态，以信仰语式引述诗人辞章，以诗化之思代替宗教品质的贫乏。时代精神的贫乏恰恰表现在：思想家们不能也不愿再去区分何为单纯的意见（doxa），何为真确的知识（episteme），何为真实的信仰（pisti）。这种哲学思想趋向，无助于克制时代的虚无主义精神。

从哲学上思考现代人的生存意义，在洛维特看来，基本问题是克服虚无主义。著名政治思想史家、洛维特的同学和友人施特劳斯看到，《从黑格尔到尼采》一书的主题是，想要厘清欧洲虚

K.L. with, “现象学本体论与新教神学”, 见刘小枫编, 《生存神学与末世论》, 李哲汇、朱雁冰等译, 上海三联版, 1995, 页79; K.L. with, 《知识、怀疑、信仰》, Göttingen, 1956, 页5及页7以下; K.L. with, “语言是人与世界的中介”, 见氏著, 《历史的生存批判文集》, Stuttgart, 1966, 页208以下。

无主义、尤其德国虚无主义出现的思想逻辑，即以歌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如何蜕变为以E. J. 朗格为代表的虚无主义。完成教职论文以后，洛维特基本上离开了哲学的直陈式论述，展开近代思想史的现象学辩证。他注意到，自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之后，费尔巴哈、马克思、基尔克果、尼采都提出了不同的人论，即便像韦伯这样的主张价值中立的社会思想家的学说，亦以其关于人的理念为基础。尼采是现代人观转变史的关键，是完成者和预言者，开启了西美尔、舍勒（M. Scheler）、克拉格斯（L. Klages）、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乃至戈培尔（Goebbels）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思想。洛维特花费了几十年时间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的幽灵纠缠。洛维特以为，尼采思想力图克服虚无主义，其永恒回归论复兴了古希腊循环的宇宙形而上学，对抗近代的进步论历史哲学，抵制直线性的历史意识。但尼采的自我永恒意志论的实质仍是替代基督教的不朽信仰论，是现代意识的自我欺瞒的表征。

比较一下施特劳斯与洛维特的问题意识是有益的，俩人有着相同的精神关怀和学术思路：通过审理思想史与虚无主义争斗。不同的是，前者致力于审理政治思想史，后者致力于审理历史观、上帝观及人观史：前者想恢复斯多亚的自然法理念，后者想恢复斯多亚的自然理念。《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与施特劳

参L. Strauss, “洛维特”，见Social Research, 4 (1941), 页512。

T. Bottmore看到，洛维特辨析马克思与韦伯的穿透力在于他对两者学说的基础（人观）的透析。参K. L. With, 《马克思与韦伯》，London, 1982, 英译本序，页10以下。

关于施特劳斯的的思想，参J. Cropsey, “施特劳斯与政治哲学史”，见L. Strauss/J. Cropsey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版，1993，下卷，页1072-1112。亦参L. With与L. Strauss讨论尼采虚无主义的书信，见Independent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516, 1988。

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双峰并立，同为近代思想史经典之作。以这部著作为顶峰，洛维特撰著了好些关于历史思想的论著。重新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是近代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虚无主义的问题意识定位于人观和上帝观的嬗变，但在洛维特看来，这些观念的嬗变与历史观的嬗变相联系。现代历史观是启蒙思想的坚核，在德国哲学思想的近代发展中，一直处于核心位置：从赫尔德（Herder）的人类历史观、黑格尔的精神历史概念、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到尼采、海德格尔的生存历史观，形成了德国哲学的基本论述传统。洛维特认为，“转向历史思想并不只是历史的唯物论（马克思）或形而上学的历史论（黑格尔）的专利品，而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之后所有（德国）思想的特征。历史哲学的出现，表明思想已不再信赖自然宇宙的理性或上帝之国，而是信赖时代精神、‘未来之轮’、‘历史的命运’”。可是，进步论的启蒙历史哲学是否能给个体人生提供依持，给人类社会提供指引，是大可置疑的。如果想从历史哲学中获得个体人生和人类社会的方向，就像把船驶入迷雾中的波涛。近代历史哲学的核心，是以历史的进步观取代了古代的世界秩序观念，这一进步概念恰是虚无主义的基因。洛维特早年的哲学人类学研究以及对近代

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思想，参古留加，《赫尔德》，侯鸿勋译，上海人民版，1985，页57-108；F.N.Kantzenbach，《赫尔德传》，任立译，北京商务版，1993，页76-83。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历史哲学的发展，参李秋零，《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版，1994；M.Buhr，《理性的历史：德国古典哲学关于历史的思考》，王步涛译，北京社科文献版，1992。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细致研究的汉语论著，为李荣添，《历史之理性：黑格尔历史哲学导论析》，台北学生书局版，1993；亦参薛华，《黑格尔对历史终点的理解》，北京中国社科版，1983。

K.L. with,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见Neue Deutsche Hefte.7（1957-1958），页876以下。

思想中人观嬗变的分析，现象学地还原到对历史哲学的审理，以便弄清近代思想究竟在何处失足。

现代性与虚无主义的关联因此是洛维特思想的基本问题意识。虚无主义就是时代精神，它的另一种表述法即现代性思想危机。这一危机体现在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神学思想三个层面，其症候性思想家分别是马克思、尼采和基尔克果。洛维特的思想论题（人观和历史观）基本上在政治思想（主要定位于历史思想）、哲学思想（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和神学思想（近代新教）这三个方维交织地展开，《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一书呈现的正是这种三重交织的透视。

三、从历史人义论到历史神义论

洛维特流亡美国后在Hartford神学院执教，利用这一机会研究早期基督教思想。清理现代历史哲学的思绪一直盘桓在他的脑海里，由此产生了这部洛维特最广为学者引述的副题为“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的论著。

这部著作的宗旨很容易引起误解，最常见的误解是把它看作为基督教的历史观辩护。此书的论述方式增强了人们的这一印象，从现代回溯到圣经的历史观。如果只是为基督教的历史观辩护，该书的思想意义相当有限。对于时代的思想课题来说，重要

参K.L. With, 《纳粹上台前后我在德国的思想生涯》，同前，页152以下。洛维特先用他并不精通的英文写该书，1949年以《历史中的道义》（Meaning in History）的书名出版（Chicago University Press）；德文本于1953年出版。

的是理解现代思想是如何发生的。洛维特个人的基督教信仰并不需要通过这种历史哲学的慎思来表达，作为哲学家，思想的使命是辨析时代的思想难题。在“绪论”中，洛维特解释其“回溯”的思想史方法时强调，他并不要“通过想像跳回到原始基督教”，而要“把‘历史哲学’这个复合词分析还原为其原始要素”。因而，此书的论述意义当从自狄尔泰以来反思历史主义的问题史来看待，恰切地说此书的基本意义乃是对历史主义的现象学批判。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以回溯的思法探究近代历史哲学的形成。近代西方的社会历史是一个世俗化过程，近代历史哲学论述与之相应，则是一个历史思想的世俗化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该书的主题是解析西方历史思想的世俗化过程。洛维特提出的基本论点是：作为历史思想的世俗化的现代历史主义并不是在18世纪才出现的，中世纪后期，对救赎历史的终极目的持末世论圣经信仰的历史神学已有近代历史哲学的端倪。近代历史哲学的思想架构取自基督教历史神学，但颠倒了历史神学的历史道义论，因而是一种反基督教的基督教世界观，因之，以超越此世为目的的历史神学滋育了以改造此世为目的的近代历史哲学。依据自律的历史力量创造美好的未来世界的革命论述与救赎此世的希望神学有内在关联，世界历史本身就是世界审判这一格言，源于历史神学的末世论对世界审判者的期待。《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的书名，明确地标明历史神学与历史哲学的

参B.P.Riesterer，《洛维特的历史观：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性探讨》，Hague, 1969。关于历史主义的汉语文献，参黄进兴，《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台北允晨版，1992，页13-116。

参E.Stolz，《特洛尔奇对现代世界的解释：近代与世俗化问题》，Hamburg, 1979，页42-48。

内在关联。

本文无需重述洛维特在该书中提出的具体的分析性论点，需要究明的是，洛维特将近代历史哲学视为反基督教的基督教世界观究竟是什么意思？要究明此意，须细致辨析近代历史观与古代历史观的差异。在洛维特看来，古代时期有两种历史时间观念，古典希腊的循环周期论的历史时间和基督教末世目的论的历史时间，近代历史思想单义的进步历史时间观在结构上类似于基督教的历史时间观。从犹太基督教传统土壤上发展出来的人的神学（eine Anthropo-Theologie）与希腊式世界神学（die griechische Kosmos-theologie）不同：人的神学把世界理解为溶合上帝和人的硫磺（*ov*），理解为神的创造（*natura ars dei*），即理解为为了人的意愿的世界（*Welt umwillen des Menschen*）。基督教的历史理解出现时，人的神学以超世的创造主观观念取代了世界之内的目的理性，古希腊以自然世界秩序为架构的“历史”（*historia*）随之被改造成天定的（*providualen*）救赎历史，从而赋予历史以普遍的末世论道义。古代历史观的这一转变所系甚大，其主要结果是：历史的自然性生成与历史的道义相分离，历史中失望与希望的交织激起的道义问题被转移到末世的未来，并从超世的维度来获得解答。基督教的末世信仰要

参K.L. With, 《从笛卡儿到尼采的形而上学中的上帝、人和世界》, Göttingen 1967, 页17。

参K.L. With, “基督教与历史”, 见西北历史学家协会编, 《基督教与历史研讨会文集》, Düsseldorf, 1955, 页9-14。洛维特的论点与现代新教神学中的历史观（F. Overbeck, A. Schweitzer, M. Werner, O. Cullmann）相关。参H. Timm, “洛维特与新教神学”, 见Evangelische Theologie, 27 (1967), 页573-594; H. Timm, “热爱命运？洛维特论基督教与异教”, 见Neue Zeitschrift für systematische Theologie and Religionphilosophie, 19 (1977), 页78-94。

求从可见的外部世界转向自我，建立与上帝的内在性关系，从基本取向上更改了对人的生存在世的历史的感受方式。在洛维特看来，基督教的超验历史观对希腊的自然性世界历史观的否弃，为近代历史哲学观的形成埋下了种子。从理念类型的角度说，西方历史观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古希腊的、基督教的和近代的。把握这三种历史观类型的差异，对下面要讨论的问题至关重要。

古希腊历史思想的基础是自然本体论，基督教历史思想的基础是神—人主体论，两者构成了欧洲历史思想发展的内在张力：融构了从奥古斯丁、约阿希姆的历史神学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嬗变动力。无论欧洲历史观如何变化，在洛维特看来，欧洲历史思想的结构都是受希腊—基督教思想规定的。近代历史哲学就其想在现世历史中实现旧约的终极救赎历史而言，是基督教式的历史观；但就近代历史哲学把《圣经》中的末世期待和预定信仰转换成现世历史的未来式进步意识而言，它又是反基督教的。近代历史哲学以基督教的末世论精神重拾希腊的自然历史旨趣，本来不具道义问题的历史，如今有了历史中的道义问题，而历史中的道义问题又不是像历史神学那样在历史之外，而是在历史之内。基督教的末世论历史观是超世取向的，近代历史哲学将此取向扭转为现世的（希腊式的），因此是基督教历史观的此世转化（世俗化）；反过来说，近代历史的世俗化

参K.L. with, 《从笛卡儿到尼采的形而上学中的上帝、人和世界》，同前，页26以下、页177。

K.L. with,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Stuttgart 1953，页147；亦参K.L. with, “基督教、历史与哲学”，见氏著，《演讲与论文集：基督教传统的批判》，Stuttgart 1966，页37-53，尤其页41以下。